

# 中國文化研究 通訊

Newsletter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y

2022年第3期

总第23期

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基地

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主办

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创新智库

西北大学黄帝文化研究院

## 顾问

张岂之 王亚杰

郭立宏 吴振磊

## 主编

李 浩

## 执行主编

张海青 赵 杭

## 责任编辑

陈战峰 王早娟

刘晓宇 刘 晓

王晨佳 郭 琳

肖 潇

## 封面题字

袁行霈

## ◆ 工作简讯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专家系列报告会圆满结束 /2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李浩教授《李浩学术文集》第一辑三种出版 /3

黄帝文化研究院相关专家赴黄帝陵考察 /4

中心协办终南论坛顺利召开 /5

## ◆ 论坛掠影

第三届终南论坛：七位著名学者为构建终南学提供多维学术观点 /6

## ◆ 专家观点

葛兆光 对中国文化的最大曲解，是刻意窄化和盲目自大 /8

土屋昌明 李白之创作与道士及上清经 /12

## ◆ 学术平台巡礼

中华文化干部学院 /23

## ◆ 学者风采

古代文学专家——张新科 /27

鲁迅研究专家——姜彩燕 /29

## ◆ 新书推介

《李杜韩柳的文学世界》 /31

《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 /32

#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专家系列报告会圆满结束

荟萃学术名家，聚焦学术前沿，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唐代文学学会专家系列报告会”历时一个半月，于近日圆满结束。

系列报告会以“探索·创新”为主题，从7月1日开始，共有十二场，内容涉及唐代文学、文献、历史、艺术研究中的多个议题，分别是：“重视唐代诗人生命周期与生存状况的研究”（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唐代鸳鸯墓志的解读与研究”（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胡人的眼睛：唐诗与唐俑互证的艺术史”（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葛承雍教授），“由宋拓《雁塔题名》看李商隐及第时间与令狐家族关系”（复旦大学查屏球教授），“岁末祭诗——从中唐贾岛到晚清诸家”（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唐代文学研究

的多维文化视野”（北京大学杜晓勤教授），“敦煌文献研究的新视野——谈谈写本书籍史方法的运用”（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唐代文学研究大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流程”（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交互中的意义生成——都城与文学的双向建构及其文学史价值”（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杨万里向唐人学习了什么”（华南师范大学蒋寅教授），“李白生命思想上佛道融合的问题——侧重于东晋以来士大夫与佛道关系的传统”（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谢公古道实地考察及其体会”（南开大学卢盛江教授）。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以主持人、与谈人身份参加了讨论。

系列讲座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其成功举办，对于唐代文学、文献诸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李浩教授《李浩学术文集》第一辑三种出版

2022年7月,长江学者、中国唐代文学会会长、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黄帝文化研究院院长李浩教授的《李浩学术文集》第一辑三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此套文集包括《唐诗的文本阐释》《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以及《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第三版)。

其中《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出版后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陕西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荣誉。《唐诗的文本阐释》,原版曾先后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5年)、第一届全国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奖一等奖(2012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一等奖(2012年)等荣誉。

李浩教授著有《唐诗的文本阐释》《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摩石录》等学术类著述,另有《怅望古今》《行水看云》《课比天大》《野生涯》等随笔类作品。此套文集为李浩教授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述,学术扎实,章法严谨,视野开阔,底蕴深厚,从各方面展现了唐诗和唐代艺术之美。



## 黄帝文化研究院相关专家赴黄帝陵考察

8月8日至9日，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帝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赵杭及研究院陈战峰副教授、王早娟副教授赴黄帝陵参加了由黄帝陵基金会就黄帝文化画廊建设有关事项组织的专题调研活动。此次调研活动共有来自黄帝陵基金会、西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美术学院等单位11人参与。

为期两天的考察中，考察队参访了黄帝陵、中华始祖堂、原黄陵县老城区以及黄帝陵周边环境的文化建设情况并参加了黄帝文化画廊建设讨论会。研讨会上，黄陵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吕国煜介绍了黄帝陵宣传的重要举措及近期计划。省财政厅原一级巡视员、黄帝陵基金会秘书长习云杰介绍了黄帝文化画廊建设构想。参与考察的各单位人员做了讨论发言。黄帝陵文化园区管委会、黄帝陵管理局、县文旅局、教科体局、住建局、文联、

规划办、黄帝文化园区建设协调办、黄帝文化研究会秘书处、陕文投黄陵投资公司、延旅集团黄陵投资公司等单位相关人员列席本次讨论会。

赵杭在讨论会中指出，黄帝陵建设工作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展开，采取多种措施更好地保护黄帝文化遗产。西北大学于2021年12月成立了黄帝文化研究院，研究院已筹备了本年度黄帝文化论坛前期相关工作，研究院希望能与黄帝陵基金会、黄帝陵文化园区管委会、黄陵县一起，在黄帝文化研究及推广领域达成多方合作，推动陕西黄帝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陈战峰副教授、王早娟副教授分别就中华始祖堂的布展文字、黄帝陵景区景观建设定位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考察活动之后，参与考察人员为黄帝陵基金会提交了考察报告，本次考察活动圆满结束。



## 中心协办终南论坛顺利召开

8月11-12日,第三届终南论坛开幕式暨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作为本届终南论坛学术委员会主任出席会议。

“终南论坛”由西安美术学院艺术研究所、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联合承办,已于2018、19年成功举办两届。论坛旨在探讨终南山与周秦汉唐文化的关系、与西亚文化和东亚文化的关系性,结合中国文学、绘画、建筑、景观、民俗、宗教等方面,建立终南文化体系,形成跨领域、跨学科的“终南学”。

11日下午,论坛开幕,西安美术学院院长朱尽晖教授、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主席杨晓阳先生、西北大学校长郭立宏教授等致辞,李浩教授宣布会议正式启动。

11日下午至12日,与会专家依次做主题发言。西安美术学院艺术研究所彭德教授《终南肆考》旨在为终南学划定时空框架及其文化的基本范围。李浩教授《“园林诗”范畴的史实与学理新说》梳理了山水诗、田园诗和园林诗的概念由来、诗歌缘起与演生变化,并引入景观学理论,为园

林诗范畴的成立寻找学理依据。中心特聘教授葛承雍先生《希腊酒神在中国的流传——考古出土古代“醉拂菻”神话驼囊》结合出土实物、传世图像及其它相关物证,展示了“希腊化酒神”的神话经典标志传入中土被接受的独特轨迹。北京大学历史系朱青生教授《艺术发生的本体论辩》对“什么是艺术”做了深入分析。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李星明教授《从舆图看山水画的发展》对山水画与舆地图加以比较研究。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谷鹏飞教授《“业余”文艺评论的价值——以范宽〈溪山行旅图〉的评论为例》,从绘画内容、创作主旨的角度,对画师“师心”抑或“师目”问题展开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夏可君教授《空白的哲学——想象王维的雪景山水画》认为“空白的活化”是王维雪景图与水墨艺术发生所隐含的哲学原理。发言结束后,彭德教授主持现场自由讨论。13日,参会嘉宾到访库峪,进行终南山文化考察。

第三届终南论坛会聚知名专家学者,搭建高端学术平台,深入挖掘终南文化的内涵,拓展终南文化的外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 第三届终南论坛： 七位著名学者为构建终南学提供多维学术观点

2022年8月11日—13日，第三届终南论坛于西安圆满举行。此届论坛由西安美术学院、西北大学主办，西安美术学院艺术研究所、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承办，丹青易考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西安市西蓝天然气集团协办。

8月11日下午2:30，论坛开幕仪式于西安高科度假酒店举行。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代表院长郭立宏转达致辞，他提出终南论坛的几大特点。第一，终南论坛旨在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破除学科的壁垒，互相借鉴，共同攻关，它有助于学科之间的联合；第二，积极鼓励并且引导青年学者。会场上有全国各地多学科的专家做主题发言，有助于强化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的建设；第三，有助于引入外部的优质资源。终南论坛起始由西安美术学院彭德先生的研究所承办，后来他不断地拓展引进外部的各种资源，使得论坛发展非常好；第四，有助于改革学术会风。终南论坛并不按照国际会议的一般惯例，一般惯例发言不超过15分钟，此届终南论坛每位学者的发言延长到一个小时以上，这样使得论坛成为一场纯粹的学术交锋、学术交流，以深入的研究扫除轻率的学术习气，展现学者对待学术的纯洁与坚韧。

8月11日—12日，七位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终南论剑，发言主题和摘要如下：

彭德《终南肆考》：本课题旨在为终南学定义划定时空框架及其文化的基本范围，分五个部

分：一、终南山与秦岭异同考；二、华山是周秦两汉中岳考；三、发源终南山的丰水曾为天下之中考；四、夏后氏崇山即终南山考；五、终南山与周秦汉唐营国考。

李浩《“园林诗”范畴的史实与学理新说》：本文梳理了山水诗、田园诗和园林诗等语词概念的由来，叙述了山水诗、田园诗的缘起与演生变化，通过唐代园林的兴盛来彰显园林诗的突出特点。作者引入景观学“四种自然说”等理论，以求从学理上界定荒野、田园和园林等自然景观环境，也为园林诗范畴的成立寻找学理的依据，为当前的文学史和唐诗史书写提供一更新的话语系统和理论范畴。

朱青生《艺术发生的本体论辩》：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如今具有意义和理解上的重大转移，这个转移实际上是将艺术主要作为“对象现象”，与将艺术主要作为“有生于无”人的问题并行发展，各有成就。书法就是一种“有生于无”的人的意义的“变现”（图像化），所以“写”可以针对汉字，也可以针对（写意）绘画。

李星明《从舆图看山水画的发展》：唐代是舆地图和山水画同时大发展的时期，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载来看，唐人对山水画和舆地图没有严格的区分，绘制山水画和舆地图在技法方面有相同之处。一方面，随着“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舆图绘制理论和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促使山水画在空间构图和物象比例趋于合理化；另一

方面，舆地图的地貌也需要用山水画的勾勒用笔、敷色渲染、水墨皴擦等技法加以表现。所以，唐代舆地图的发展也是促进山水画发展的原因之一。文人和官员为皇帝和朝廷绘制的山水画，与舆地图在文化内涵方面往往有相同或接近的意义，即含有天下万方的政治理念，渗透着皇权思想。

夏可君《空白的哲学——想象王维的雪景山水画》：作为盛唐时代的代表人物王维，集诗画乐为一体，作为南宗文人画之祖的王维，迷人的其实是他的山水画，而谜中之谜则是他的雪景图，流传至今的恰好也是他的雪景图，我们将动用艺术史的充分资源来系统分析雪景图的基本语汇，而无论真假，后世都必须想象一个王维。但为什么是雪景图？为什么水墨山水画在王维那里发生？水墨艺术发生的机制对于当代水墨艺术有着什么样的启发？一个古典的问题如何具有当代的价值？因为它关涉到中国哲学空白的敞开，“空白的活化”是王维雪景图与水墨艺术发生所隐含的哲学原理。

葛承雍《希腊酒神在中国的流传——考古出土古代“醉拂菻”神话驼囊》：在汉代人心目中“亦真亦幻”的罗马人被称为“大秦”，魏晋以后又将继承希腊罗马文化的拜占庭帝国称呼为“拂菻”，地处欧亚大陆的东西两大强国，有无往来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

谷鹏飞《“业余”文艺评论的价值——以范宽〈溪山行旅图〉的评论为例》：《溪山行旅图》为北宋范宽(约950—1032)山水画名作。明董其昌曾题跋“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195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李霖灿发现画幅右下树荫里隐有“范宽”字款，证明画作为范宽真迹。画作从诞生至今，围绕其主题与风格，展开多样争论。争论的一大焦点是：画作是师“心”还是师“目”，用今天的话说，是“写意”还是“写实”？本讲从绘画内容、创作主旨的角度，结合“业余评论”所见，展开述评。

8月13日，在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周晓的带领下，参加此次论坛的嘉宾们进行了终南山文化考察，先后参访了库峪河乡村振兴农家乐产业升级示范点——匠南山、摩诃慈恩寺（终南库峪历史文化交流），并于元敦中医馆进行了中医文化交流与健康养生体验，为助力乡村全面发展建言献策。通过深入终南山深处，体验当地人文和自然风光，众专家学者更加了解终南文化的博大和神奇，为后续研究和推广增强信心。

本届终南论坛在学术领域更加跨界多元，集结学界精英，对终南这一学术话题持续进行多维度解读。终南论坛将连续举办，辐射到文化的各个层面。相信通过深入研究并不断扩大学术影响和与社会生活的当代链接，定能构建出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新方向，最终会形成“终南学”。

# 对中国文化的最大曲解，是刻意窄化和盲目自大

葛兆光

##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从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是非常多的，从林则徐、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有以下几个特别的考虑，先向大家“从实招来”。

第一，是我们过去对中国文化的讨论，或者给中国文化的界定，往往是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我们有一些高度概括的形容词，可是说实话，你听完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不符合一个历史学者的习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

第二，我也有我的担忧。最近这些年，很多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文化，诸如“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多大的意义”，等等。可是，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首先会把它“窄化”。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是有人却把中国文化窄化为汉族文化，然后又窄化为汉族里面的儒家文化，然后再窄化为他认为是正统、经典的儒家文化。

第三，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些人带着一种很奇怪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文化优越感。因此，在所谓“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就会有一种错觉，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理性地、历史地、自

觉地认识中国文化，这样才能够和各种民族、各种文化有互相交往、互相理解与平等的态度。

## 中国文化的五种特质

我今天希望能够讲清楚的是，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文化。即中国文化的特点，什么在中国比较明显，在外国不太明显。但是，我这里还要作一个界定，下面讲的主要是汉族中国的文化。

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通过汉字思维。大家要知道，现在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像中国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以外，所有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基本都在生活中消失了，只有汉字仍然和它最起初的象形性、原初性，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汉字有的是象形的，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等，这个在古代中国叫作“文”。这是古人通过图像，直接描绘他所看到的事物。

但是，这些字不够，就加上会意，就是在一些象形的文字上，加上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比如说刀口上加上一点，就是“刃”；爪放在树上，就是“采”；牛被关在圈里面，就是“牢”。会意还是不够用，就加上声音，成为形声字，比如说江河松柏等等。基础的汉字主要是这三类，当然六书有六种，但主要的是这三类。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类，基础都是形。因此，用汉字来说话、思考、阅读、书写，就会带来很多特征，可能会有一些重感觉重联想、但语法相对简单的特点。

在古代中国，汉字这种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历史上没有中断，延续到现在，它对我们的思

维、阅读和书写,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东亚,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

第二个,是“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我上课的时候,尤其是给外国学生上课的时候,要出一个题,这个题就是,贾宝玉应该管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叫什么?外国人总搞不清楚,他们说 sister。为什么中国称谓这么复杂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家族、家族共同体,要想有秩序,必须把远近亲疏关系界定得非常清楚,这就涉及到中国伦理原则和等级秩序。

简单地说,这里其实就是两个原则,一个是以“内外有别”,父母夫妻之间,分内和外,也就是说,女性的亲族和男性的亲族,等级远近是不一样的。在古代中国,是分得很清楚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上下有序”,必须讲清楚上下,伯仲季叔,分得清清楚楚,不能乱。

这两个原则,在丧服制度上表现得最明显。一个人死了之后,在这个人的丧礼上穿什么衣服,一方面表示你和死者关系远近如何,一方面通过丧服,把一个大的家庭、放大的家族、更大的家族共同体联结起来。而中国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体再放大,就是国家。西方不论是 country、state 都没有“家”的意思,中国偏偏有“国家”和“家国”,因为在中国观念世界里面,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在国家层面上也是非常严格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儒家学说。

第三个,汉族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不约而同讲过几乎相同的话,叫“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也就是说,儒家管

社会治理,佛教管精神修养,道教管身体修炼,三教看起来蛮融洽的。其实从历史上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佛教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

第四个,是中国最有趣的阴阳五行。阴阳不说了,五行有两大原则。一个是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的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相克的轮转。第二个原则是,五行可以串联万事万物,比方说,五行可以配五方,东南西北中;可以配五色,青白赤黑黄;可以配五声,宫商角徵羽;还可以配五味,酸甜苦辣咸,等等。

把万事万物连成一个大网络,这是我们先人对宇宙万事万物认识的知识基础,大家现在学了科学,对这个有怀疑,但是在古代,这就是我们理解世界最关键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产生了一整套知识和技术。

第五个,是中国天下观念。中国古代的世界观,跟其他国家和民族很不一样。古代中国人有一个宇宙想象叫做天圆地方,就是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即天是圆的,像斗笠一样,地像围棋棋盘一样。天的中心在哪里呢?古人想象在北极。古人认为大地的中心在哪儿呢?“洛者,天之中也”,洛阳是大地的中心。这是因为这套观念形成的时候,大概是东周,那时候王都在洛阳。所以,古代中国人以洛阳为中心。想象中一圈圈放大,这就是大地的形状,所以有“九服”或者“五服”的说法,每服五百里,两边各有五百里,就是一千里,“五服”就是五千里,大地就是这么方方的。

但是,从这里形成的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越在中心的人,文明程度就越高,越在边儿上的

## 中国文化研究通讯

人，文明程度越低，这就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中国很早形成了“华夷观念”，认为中国人是文明人，周围人是野蛮人，野蛮人要接受文明人的教化，就形成了一套“天下观念”，即以我为中心想象世界。这个想象和观念逐渐发展，不仅成为一种民族志、地理志里面的文化观念，也形成了政治制度即“朝贡体系”。

这五个方面如果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非常明显的属于汉族中国的文化。可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现代中国是五方杂糅形成的，就连汉族本身，也是五方杂糅的。从秦汉到隋唐，其实不断有外族进来，汉族也是逐渐吸纳、融合、杂糅了其他民族才形成的。

中国文化是复数的文化，不是单数的文化。

### 不同以往的文化转型

历史上，中国在很长时间，总是“在传统内变”，主流文化始终还是在汉族文化传统系统里面作调整，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佛教、三夷教、伊斯兰教，还是明清天主教，始终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挑战和改变这个汉族中国文化，所以，变化都是在传统内部的调整、适应、改革、变化。但是，到了晚清，由于坚船利炮、西方东渐的原因，中国不得不“在传统外变”，不得不超出传统，文化就面临危机。

从 1895 年到 1919 年，这是中国思想和文化转型最重要的时段，在这个时段你会看到很多变化，以前所谓的“三纲五常”变了，变得很彻底很厉害。面对西洋和东洋列强，中国人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心态中。以前那种很自信、很安定的样子已经很难看到了，优雅、宽宏和从容，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相应地，刚刚我们讲的汉族中国的文化的五

方面也出现了变化。

第一个是汉字。“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白话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普及识字率，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旧文化断裂的问题。以前的书面语言，也就是文言，它代表典雅、礼貌和尊严，也代表着有教养、有文化，现在不再有了。当以前的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之后，使得雅言和俗语失去等秩，同时也使雅、俗不再有分别。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自从白话文成为主流之后，写信已经不再有典雅方式了。现代汉语掺入了太多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这些词汇进来以后，使得我们通过语言感知的世界已经变了。特别是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中国提倡简体字，使得文字和原来的形象之间的距离更拉大了。简体字虽然方便学习，但是离开原来的“形”，越来越像抽象符号，传统汉文化里面，通过形象的文字思考、书写和表达的这个因素，就发生了问题。

第二个，家、家族、家国，以及儒家学说，也出现了问题。虽然现代中国尤其是乡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家庭、家族组织，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但是，城市化、小家庭化、人口流动，使得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密切的、彼此依赖的邻里、乡党、家族关系，已经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因此，儒家家族伦理与国家学说，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基础。

第三个是信仰世界。自从晚清以来，儒家在西洋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渐渐不再能够承担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佛教与道教也在西洋科学思想的冲击下，受到“破除迷信”的牵累，逐渐退出真正的精神、知识和信仰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体制化和

旅游化。因此,传统的信仰世界也在危机之中。

第四个是阴阳五行,在科学的冲击下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它在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解释世界万事万物了。阴阳五行学说,现在基本只在中医、风水、食补等领域里面还保存着。在整个现代的知识系统里面,它已经到了很边缘的地方。

第五个是“从天下到万国”,基本的世界观念变了。随着晚清以后西洋进入东方,不仅摧毁了原来中国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也重新界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古代传统里面的宇宙观、世界观、朝贡或册封体系,已完全不现实了。

### “文化”与“文明”有何区别

我这里想引用一位德国学者伊里亚斯的见解,他在《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中提出,可以把“文化”和“文明”做一个界定和区分,即“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接下来伊里亚斯又指出,“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则常常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有规则”等词语相连。虽然“文化”是让你随心所欲表现自己特色的,但“文明”是给你一些限制和规则的。如果这样理解“文明”和“文化”,我们就不必对全球化和现代秩序恐惧,也不必担心我们

的文化会被侵蚀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普遍的文明和规则中,守护好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再接下去,我还必须说明,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异质“文明”的抗拒。毫无疑问,文明始终是在不断侵蚀文化,我们承认这一点,因为“文明”常常是在前进的,时时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这两者怎么协调?

我们今天讲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普遍文明规则下,能够保存好特别的文化,同时在现代文明的时代,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在历史中的合理性。

比如说,我们在接受和赞美科学的同时,对于阴阳五行能不能有一些同情的、历史的理解?又比如说,我们在接受普遍的法律和制度的时候,能不能够对传统中国的家、家族、家国的伦理和道德准则有一点历史的理解?再比如,我们能不能在接受新的文明的时候,对传统宗教也能够有一些温情?同样,我们能不能够在接受万国平等原则的同时,也能对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历史习惯有一点点理解?

我本人是研究历史的,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我们必须要在历史当中看,我们承认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对两者都要有同情。

(本文原刊于《决策探索》2015年9月刊,原标题为《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图文转引自微信公众号“壹学者”。葛兆光,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 李白之创作与道士及上清经

土屋昌明

我们研究一位诗人创作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时，往往疏忽了诗人与道士的直接联系。当唐代还没有使用印刷技术的时候，一位诗人怎样面临道教知识呢？除了家庭教育以外，似乎是诗人本人与道士或者道观有交流，就能学到相对具体的道教知识。诗人要是用道教的专门知识来创作，他有可能通过道士或道观的中介来听到道教教义、阅读道教经典。因此，我们要研究诗人的道教知识时，首先要了解，诗人到底与哪位道士有交流？这位道士的道术如何？就是说，我们了解到诗人应有的道教知识，更方便于理解他们创作中的道教因素。否则的话，我们只能指出所谓“神仙思想”“道教气味”等相对暧昧的感觉而已，并不能理解诗人创作与道教知识之间的直接关系。因而诗人与道士或道观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特别是我们要研究李白这位被称为“谪仙人”的诗人，更

需要运用这种方法。李白少年时最好的朋友就是峨嵋道士元丹丘，而且交往一生。关于元丹丘已有研究<sup>[1]</sup>，我在此拙文中要谈谈李白与其他道士的直接关系及其对李白创作的影响<sup>[2]</sup>。

—

李白的诗文中能看到不少道门之徒的名字，如《赠嵩山焦炼师并序》中的焦炼师，看上去就是李白在嵩山修道时偶尔碰到的一位道士。

嵩山有神人焦炼师者，不知何许妇人也。又云：生于齐、梁时，其年貌可称五六十。常胎息绝谷，居少室庐，游行若飞，倏忽万里。世或传其入东海，登蓬莱，竟莫能测其往也。余访道少室，尽登三十六峰，闻风有寄，洒翰遥赠。

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烟。

中有蓬海客，宛疑麻姑仙。

道在喧莫染，迹高想已绵。



苏轼《李白仙诗》

纸本墨书，北宋，34.5 cm × 106 cm

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时餐金鹅蕊，屡读青苔篇。  
八极恣游憩，九垓长周旋。  
下瓢酌颍水，舞鹤来伊川。  
还归空山上，独拂秋霞眠。  
萝月挂朝镜，松风鸣夜弦。  
潜光隐嵩岳，炼魄栖云幄。  
霓裳何飘飖，凤吹转绵邈。  
愿同西王母，下顾东方朔。  
紫书倘可传，铭骨誓相学。<sup>[3]</sup>



李白《赠嵩山焦炼师并序》  
载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明正德十五年安正书堂刊

在此序中没有说到焦炼师的名字，这里搞不清楚她到底是谁。序中说“世或传”，表示她不只是一个山中的修道人，而是当时较为著名的道士。李白最后以西王母的比喻来表明想要入她的道门学习她的道术。中国学者认为，焦炼师也许和当时其他诗人所说的焦炼师为同一个人，也即是《广异记》中的焦炼师。先把这些资料列举如下。

李颀《寄焦炼师》：“得道凡百岁，烧丹惟一身。悠悠孤峰顶，日见三花春。白鹤翠微里，黄精幽涧滨。始知世上客，不及山中人。仙境若在梦，

朝云如可亲。何由睹颜色，挥手谢风尘。”诗中“三花”也在李白的该诗里使用，按照王琦注释引用《述异记》，是嵩山少室山中所见的一种树木，一年能开三次花。因此，李颀所说的“孤峰”的确是少室山，“焦炼师”是住在嵩山的焦炼师无疑<sup>[4]</sup>。

王昌龄《谒焦炼师》：“中峰青苔壁，一点云生时。岂意石堂里，得逢焦炼师。炉香净琴案，松影间瑶墀。拜受长年药，翩翻西海期。”“中峰”就是嵩山中峰，这里说焦炼师住在嵩山。



王翬《嵩山草堂图》  
绢本浅绎，清，200.9 cm × 99.2 cm  
现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 中国文化研究通讯

钱起《题嵩阳焦道士石壁》：“三峰花畔碧堂悬，锦里真人此得仙。玉体才飞西蜀雨，霓裳欲向大罗天。彩云不散烧丹灶，白鹿时藏种玉田。幸入桃源因去世，方期丹诀一延年。”

“嵩阳”一词表示这个焦道士住在嵩山。“锦里”是成都，表示焦炼师来自四川。另外，钱起还有《省中春暮酬嵩阳焦道士见招》。

王维《赠东岳焦炼师》：“先生千岁馀，五岳遍曾居。遥识齐侯鼎，新过王母庐。不能师孔墨，何事问长沮。玉管时来凤，铜盘即钓鱼。竦身空里语，明目夜中书。自有还丹术，时论太素初。频蒙露版诏，时降软轮车。山静泉逾响，松高枝转疏。支颐问樵客，世上复何如。”虽然诗题上说东岳，但是“新过王母庐”，据《汉武帝内传》记载，王母庐在嵩山，因此这个焦炼师也是嵩山的。王维另有《赠焦炼师》。可以说，李白、李颀、王昌龄、钱起、王维等诗人都在开元时期陆续和焦炼师见面或者赠诗。而且，这些诗人相互交往比较频繁，他们诗中用语相似，可能共有焦炼师的信

息。这表示焦炼师不仅是一个著名的道士，也是能吸引当时文人的兴趣的。而且，王维说“频蒙露版诏，时降软轮车”这句表示皇帝往往邀请她下山来到京城。

《广异记》有这样的记载：

唐开元中，有焦炼师修道，聚徒甚众。有黄裙妇人自称阿胡，就焦学道术。经三年，尽焦之术，而固辞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已是野狐，本来学术，今无术可学，义不得留。焦因欲以术拘留之。胡随时酬答，焦不能及。乃于嵩顶设坛，启告老君，自言：已虽不才，然是道家弟子，妖狐所侮，恐大道将隳。言意恳切。坛四角忽有香烟出，俄成紫云，高数十丈，云中有老君见立。因礼拜陈云，正法已为妖狐所学，当更求法以降之。老君乃于云中作法，有神王于云中以刀断狐腰。焦大欢庆。老君忽从云中下，变作黄裙妇人而去。

这里的焦炼师没有性别，但是开元时期嵩山的道士。我们将其和诗人所提的看作同一个人，似乎是可以的<sup>⑤</sup>。我认为，这个焦炼师应该是天宝二载《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以下简称《祥应记》)中所见的上清羽人焦真静。《祥应记》说：“(玉真公主)回口言旋，息驾太室，扪日阙，步玄门，掘上清羽人焦真静于中峰绝顶，访以空同吹万之始，丹田守一之妙。”

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为什么访问嵩山的道士，后面再讲。这里所说的焦真静天宝二载住在嵩山(“太室”“中峰”)，玉真公主执女弟子之礼，焦真静的道术是“访以空同吹万之始，丹田守一之妙”，与李白所说的“胎息”、王维所谓“自有还丹术，时论太素初”是一致的。这样一来，诗、故事和碑文三种资料可以互相参考了。另外，道教经典里面也能发现有关她的资料。元朝时期成书的



王维《王摩诘文集十卷》

宋刻十一行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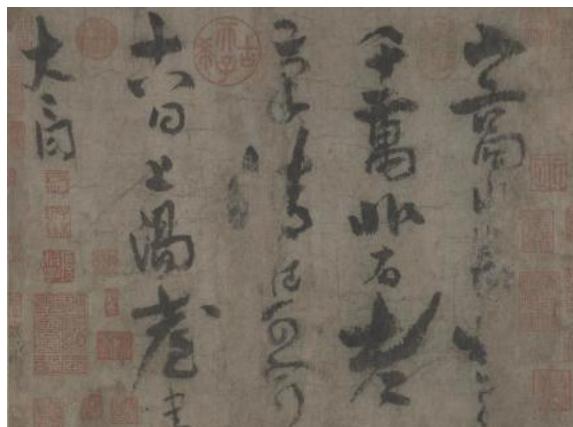
佚名《仙岩寿鹿图》

绢本设色,宋,117.2 cm×61.3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四说：“唐女真焦静真，因精思间，有人导至方丈山，遇二仙女，谓曰：子欲为真官，可谒东华青童道君，受三皇法。请名氏，则司马承祯也。归而诣承祯求度，未几升天。尝降谓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于陶都水之任，当为东华上清真人。”<sup>[6]</sup>此处为焦静真，《祥应记》说是焦真静，名字反过来了，但是这种现象在古书里不算问题。它的资料来源可能是中唐人李渤《真系》（《云笈七签》卷五）。这里明确写着焦静真是个女道士，为当时最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的高

足，茅山李含光的同门。据《旧唐书》卷一九二本传等记载，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自号白云子，年二十一拜潘师正为师，正式出家于嵩山。一般认为司马承祯继承了潘师正的符篆、辟谷、导引、服饵等道术以及六朝以来的上清道教经典，成为陶弘景以后法统的三传弟子。景云二年，奉旨入宫，睿宗向他询问阴阳术数和修身治国的大事，司马承祯对以顺物自然，深受睿宗的赞许。玄宗时，曾被多次召见，玄宗师从他亲受法篆和上清经法。开元十五年，又命他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令玉真公主至其所居修金篆斋。玄宗听从司马承祯的建议，敕五岳各置一所真君祠，其形象制度皆按照道经制造。司马承祯和皇室关系非常密切，焦静真是他的入室弟子，玉真公主和她的关系便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李白《上阳台帖》(局部)

阳台观为司马承祯入住之地

纸本墨书,唐,28.5 cm×38.1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另外，李白所说的“世或传其入东海，登蓬莱，竟莫能测其往也”，此文描写成“因精思间，有人导至方丈山”。这点我们还能找到别的资料。《云笈七签》卷一一三下所见《续仙传》司马承祯

传说：“又蜀女真谢自然泛海将诣蓬莱求师，船为风飘到一山，见道士，指言：天台山司马承祯名在丹台，身居赤城，此真良师也。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非舟楫可行，非飞仙无以到。自然乃回求承祯受度，后白日上升而去。”《续仙传》为五代沈汾撰。显而易见，这段文字是按照李渤《真系》来改成当时著名的女仙谢自然的故事的，或许按照原来的焦静真传说改成的，因为李白既然说“世或传其入东海，登蓬莱”，那么他当时已经耳闻焦静真至蓬莱求仙之传。就是说，谢自然拜司马承祯为师，是把焦静真的故事改头换面的结果。那么，《道藏》所见《续仙传》是不是反映焦静真原来的故事？

谢自然蜀华阳女真也。幼而入道，其师以黄老仙经示之，一览皆如旧读，再览诵之不忘。……常鄙卓文君之为人，每焚修瞻祷王母麻姑，慕南岳魏夫人之节操。及四十，出远游，往青城、大面、峨嵋、三十六靖庐、二十四治。寻离蜀，历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灵迹之所，无不辛勤历览。后闻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居玉霄峰，有道孤高，遂诣焉。……每登玉霄峰，即见沧海蓬莱，亦应非远人间，恐无可师者。于是告别承祯言去游蓬莱，



(传)赵大亨《蓬莱仙会图》  
绢本设色，南宋，54.2 cm × 86.4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挈一席以投于海，泛于波上。适新罗船见之就载。……忽风转船，乃投易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树香雾，走兽与禽，皆黄色。船人俱上山，见石无大小悉是硫黄。……有道士数人，侍者皆青衣……(道士)引(谢)自然入，虔恳礼谒。道士问：欲何往？自然曰：蓬莱寻师求度世去。道士笑曰：蓬莱隔弱水，此去三十万里，非舟楫可行，非飞仙莫到。天台山司马承祯，名在丹台，身居赤城，此乃良师也。可以回去。……自然欣然复往天台。……(司马承祯)于是传授上清法……(《道藏》第5册，《续仙传》)

其实，谢自然是贞元时期的女冠，据《太平广记》所见《集仙传》，她贞元三年于开元观诣程太虚，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升天，“士女数千人，咸共瞻仰”<sup>[7]</sup>。因此，谢自然诣开元时期的司马承祯，其时间根本不合适，唐代谢自然的传说决不像《续仙传》记载的那样。可以说，《续仙传》的有些构成要素来自焦静真的故事。根据《续仙传》，她生于四川，“及四十，出远游，往青城、大面、峨嵋、三十六靖庐、二十四治”就是巡礼天师道圣地。这表示她从四川的天师道开始修道。“寻离蜀，历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灵迹之所，无不辛勤历览”，是王维所说的“先生千岁馀，五岳遍曾居”。“每登玉霄峰，即见沧海蓬莱，亦应非远人间，恐无可师者。于是告别承祯言去游蓬莱”，是李白所说的“世或传其入东海，登蓬莱”以上检讨表明，李白以及其他诗人们访问赠诗的女道士名叫焦静真，是当时道教领袖司马承祯两位得意弟子之一，她的道术从四川天师道入手，后得到上清经法，跟玉真公主等皇族有宗教方面的交往，当时已经有关于其的神秘的修道故事。



佚名《仙女图》

纸本设色，元，123.1 cm × 86.2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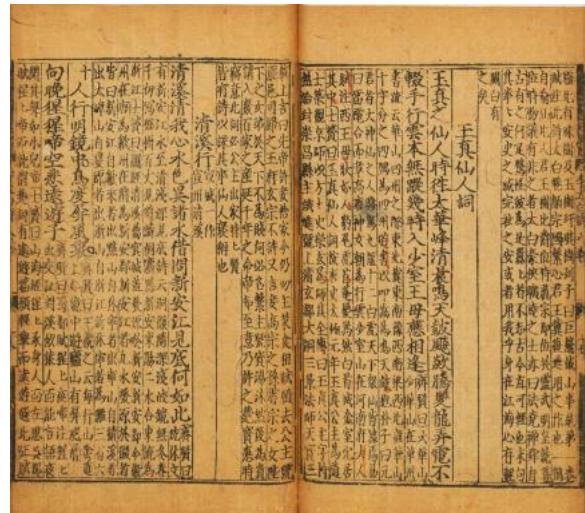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 二

通过对焦炼师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李白、焦静真、玉真公主三位人之关系。玉真公主曾将李白推荐给翰林院<sup>[8]</sup>。其实，李白也可能参加天宝元年“高道科”<sup>[9]</sup>，那时推荐人大概是玉真公主。李白是开元年间、玉真公主是天宝二年访问焦静真的。我们就这三个人的关系来阅读李白的《玉真仙人词》，则有新的解释和启发。其词云：

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飚欻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

前人认为，这首诗是李白头一次入京访问玉真公主时作<sup>[10]</sup>，最后一联表示李白没能跟玉真公主见面，愿意早日实现谒见的机会。我认为，这首



李白《玉真仙人词》

载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明正德十五年安正书堂刊

诗表扬玉真公主的道术之高。其中“鸣天鼓”，王琦注引《云笈七签》卷四五所载《九真高上宝书神明经》“叩齿之法，左相叩名曰打天钟，右相叩名曰捶天磬，中央上下相叩名曰鸣天鼓”，就是道教斋醮时所作的道术之一。《九真高上宝书神明经》在《道藏》里没有收入，《云笈七签》引用过一次，其实王琦所引用的文字能在《上清紫精君皇初紫灵道君洞房上经》上发现：“高上宝神明科经说曰：叩齿之法，左左相叩，名曰叩天钟，右右相叩，名曰捶天磬，中央上下对相叩，名曰鸣天鼓。……若存思念道，致真招灵，当鸣天鼓。”<sup>[11]</sup>据此，李白说“清晨鸣天鼓”的意思，是指玉真公主做斋醮存思而招真灵时的鸣天鼓。关于玉真公主的鸣天鼓，《祥应记》上也有记载：“甲辰言功受秩，清晨解散，复有祥飙蓬蓬然中坛而起，若神官羽驾，归飞于太空，时闻步虚□□□□徐转，公主乃鸣天鼓，贯斗精，延立久之，返乎居室矣。”这一记载证明玉真公主实践所谓鸣天鼓的道术而且其技巧水平不凡。



佚名《金阙玄元太上老君八十一化图》(局部)

“清晨鸣天鼓”的对仗“飄欵腾双龙”也表示玉真公主的道术。“飊欵”没有王琦的注释，安旗先生引用《全唐文》卷六二四冯宿《大唐升元刘先生碑铭》“乘飊驾欵”，认为是疾风的意思。我认为，“飊欵”是用上清经法来存思体内神时产生的双龙。《上清紫精君皇初紫灵道君洞房上经》说：“存月中有两白气，径来入两足底跖心中，良久足底各化生两白龙，在我之左右也。左龙名曰飊精，右龙名曰欵亭。二龙并吐白烟，入我鼻两孔中，径达肺。”(《道藏》第6册)这种道术叫做“上清乘飊欵之道”。安旗先生所引用的冯宿《大唐升元刘先生碑铭》的用例就是这个意思。玉真公主用这种上清经法而“往太华峰”，结果她到达嵩山。这一路程和《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是一致的。

玉真公主先到洛阳后去嵩山，然后去王屋山作斋醮，这是为了纪念玄宗天宝元年至二年对玄元皇帝老子加尊号。按照《旧唐书》卷二四《礼仪

志》：“至天宝元年正月癸丑，陈王府参军田同秀称于京永昌街空中见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圣寿无疆之言传于玄宗，仍云桃林县故关令尹喜宅傍有灵宝符。……于是置玄元庙于太宁坊，东都于积善坊旧邸。二月丁亥，御含元殿，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就是说，天宝元年玄宗陆续实行道教强化措施，为了纪念国家太平，天宝二年正月加玄元皇帝尊号大圣祖三字，三月亲自谒玄元宫，圣祖母益寿氏号先天太后，在谯郡置庙。玉真公主正是为此去东都的。《祥应记》云：“明年(天宝二年)春三月既望，乃诏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法师玉真长公主有事于谯郡御真宫，洎名



张渥《瑶池仙庆图》  
纸本浅设色，元，116.1 cm × 56.3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山列岳，靡不展□，将以伸诚敬□□□□□也。”

根据《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玉真公主到东都作斋醮之后访问嵩山焦静真。因此我认为，李白所说“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的王母不是喻玉真公主而喻焦静真。李白在《赠嵩山焦炼师并序》中也对焦静真用过西王母的比喻。李白《玉真仙人词》为什么不对皇帝的妹妹称为西王母？因为焦静真是她的师傅，宗教上的地位比玉真高得多。李白在该诗上使用“王母”和“鸣天鼓”两个道教词汇，其背景可考察《汉武帝内传》。据《汉武帝内传》，西王母请上元夫人将“六甲灵飞等十二事”传授给汉武帝，上元夫人“于是闭诸淫，养汝神，放诸奢，从至俭，勤斋戒，节饮食，绝五谷，去膻腥，鸣天鼓，饮玉浆，荡华池，叩金梁。按而行之，当有冀耳。”“鸣天鼓”是上元夫人传授给他的道术之一。另外，“六甲灵飞”也是跟玉真公主有关系的。《祥应记》有记载：“(玉真公主)佩五老真印，仗八威神策，端五度灵飞六甲，传豁落七元，或日月交辉，或云霞动色，晃朗天宇，扬光仙山。”可见，上元夫人所授的道术，玉真公主也使用。关于“灵飞六甲”，据传明代晚期发现一卷开元年间写本《灵飞六甲经》，流入董其昌手，海

宁陈氏刻《渤海藏真》丛帖时，由董其昌那里借来而刊刻。现在，清代《滋蕙堂帖》翻本卷末有跋文曰“大唐开元廿六年戊寅二月己亥朔一日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长公主奉敕检校写”<sup>[12]</sup>。这些都是玉真公主和《灵飞六甲》相关的例证。就《玉真仙人词》中的道教术语使用情况来看，这首诗是李白了解到玉真公主的道术后所作，不应是李白第一次入京时作。最合适的时间是李白在长安、玉真公主经过华山去洛阳的天宝二年正月左右<sup>[13]</sup>。如果这个假说可以成立，根据李白《玉真仙人词》来推测李白开元十八年入过西京，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 三

下面，我们要讨论李白的道教知识。通过解释《玉真仙人词》，我们知道李白有《上清紫精君皇初紫灵道君洞房上经》的知识。这套道经应该为南北朝时期上清经典。李白诗文还有不少用南北朝时期上清经典的证据。李白从哪儿学到这种极为专门的道教经典？我认为，研究李白的道教知识时，除了元丹丘、玉真公主以外，还有胡紫阳很值得研究。开元二十年（732）李白、元丹丘和他的弟弟元演一起访问了湖北随州胡紫阳。李白《题随州紫阳先生壁》云：



钟绍京《小楷灵飞经四十三行》

纸本墨书，唐，20.8 cm × 80.1 cm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忽耽笙歌乐，颇失轩冕情。

终愿惠金液，提携凌太清。

在这里李白请胡紫阳指教道术。又有一首诗《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云：

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胡公身揭日月，心飞蓬莱。起餐霞之孤楼，炼吸景之精气。延我数子，高谈混元。金书玉诀，尽在此矣。

“胡公”为胡紫阳，由此诗来看，李白似乎得到胡紫阳之道术了。那么，胡紫阳的道术如何？李白《汉东紫阳先生碑铭》云：

(胡紫阳)始八岁经仙城山，□□□□□□□  
□□□□有清都紫微之遐想。九岁出家，十二休粮。二十游衡山，云寻洞府，水涉冥壑。神王□□  
□□□□□□召为威仪，及天下采经使。因遇诸真人，受赤丹阳精石景水母。故常吸飞根，吞日魂，密而修之。

李白指出胡紫阳道术的核心为“受赤丹阳精石景水母。故常吸飞根，吞日魂，密而修之”。王琦注引用《真诰》与梁丘子《黄庭内景经注》云：

《真诰》日中五帝字曰：……凡十六字。此是金阙圣君采服飞根之道，昔受之于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经》。梁丘子《黄庭内景经注》：《上清紫文灵书》有采飞根之法，常以日初出东向叩齿九通，毕，阴咒日魂名，日中五帝字曰：……祝呼此十六字，毕，瞑目握固，存想日中五色流霞来绕一身，于是日光流霞俱入口中，名曰日华飞根玉胞水母也。

梁丘子《黄庭内景经注》所见《上清紫文灵书》，相当于现在《道藏》(第11册)所载的《皇天

上清金阙帝君灵书紫文》。其本书又称《灵书紫文上经》，南北朝时期上清经典之一，与《真诰》卷五、九、一八的《紫文》有一定联系。《道藏》还有《大微灵书紫文琅玕华丹神真上经》《大微灵书紫文仙忌真记上经》《洞真太上紫文丹华》均与《上清紫文灵书》有关系<sup>[14]</sup>。李白所说“赤丹阳精石景水母”，也见《洞真上清青要紫书金根众经》，此法与《皇天上清金阙帝君灵书紫文》有点不一样，可能是个变态<sup>[15]</sup>。胡紫阳的道术到底如何，我们不能确定。不过，基本是如上所述的那样，是一种上清经法的内观冥想法。根据李白《汉东紫阳先生碑铭》的记载，胡紫阳也是司马承祯的弟子，李含光的同门。因此，可以认为李白通过胡紫阳学到的道教知识一定跟《上清紫精君皇初紫灵道君洞房上经》《皇天上清金阙帝君灵书紫文》《洞真上清青要紫书金根众经》等南北朝时期上清经的道术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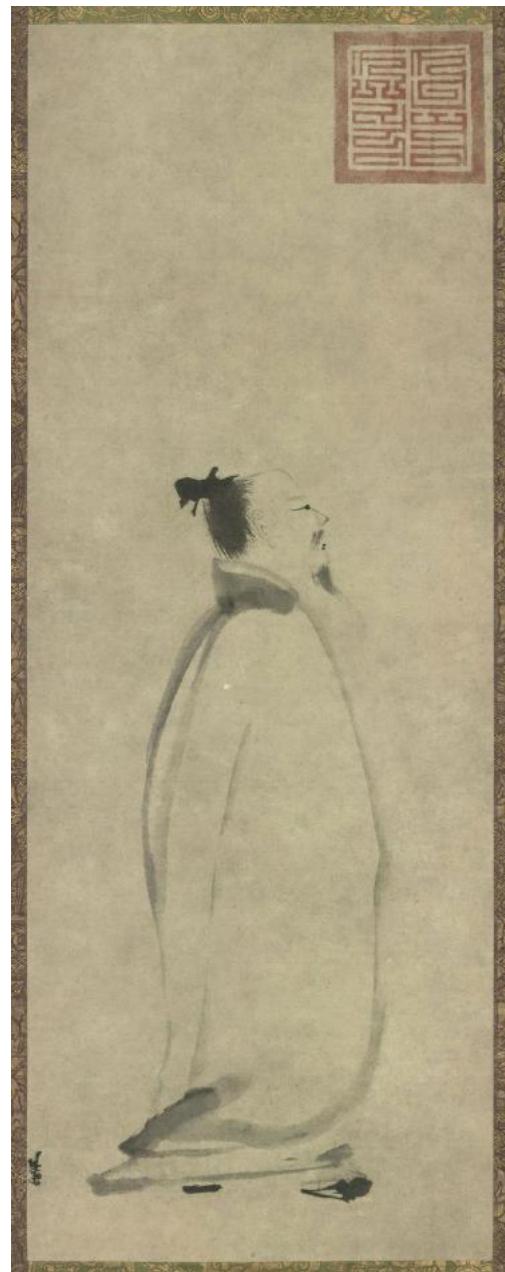
在此举一个李白使用上清经词汇的例子。李白天宝元年四月作《游泰山六首》<sup>[16]</sup>，诗中有不少道教术语。其中，《其一》使用以上所述的道经的知识很明显。该诗后一段云：

“洞门闭石扇，地底兴云雷。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银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玉女四五人，飘飖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在这首诗中，李白想象玉女从金银台降临而给他流霞之杯的场面。关于“流霞”，王琦注云：《抱朴子》：项曼都入山学仙，十年而归家，曰：仙人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辄不饥渴。其实，“流霞”是个在《皇天上清金阙帝君灵书紫文》上常见的道教词汇<sup>[17]</sup>，表示太阳光线的精华。据我了解，关于“金银台”，李白《登高丘而望远海》云：“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金阙”指的是金阙帝君

的金阙宫。《洞真上清青要紫书金根众经》卷下说：“上清金阙宫在三元宫之北，相去五万里，……台外有四门，门有两阙，一阙金，一阙玉，……内有清精玉芝流霞之泉。……阙下则有青龙白虎处在，左右天兽巨虬备卫玉阙。玉童玉女各三百人，散香其间，阙上有九层金台。”根据这个记载，李白所想象的是，玉女把上清金阙宫门内的流霞泉水打过来交给他。这是一种向阳光坐而取其生命力的道术。这种冥想必须通过想象神仙和生命象征的具体状态而实践。比如说，初升的太阳的光彩做成玉女带来的流霞，她们出来的地方有金台，金台下有流霞出来的清泉。这些都要想象成很具体的物质存在。我认为，这种解释令该诗所描写的场面更富有神秘感，更接近于本来的想象力。

总而言之，李白赠诗的对象焦炼师与开元天宝时期著名诗人们说到的焦炼师是同一个与玉真公主有宗教上交流的上清女道士焦静真。她是司马承祯入室弟子，也是李含光、胡紫阳的同门。李白以及他的好友元丹丘访问胡紫阳的道观，受胡紫阳的道术。胡紫阳学得六朝上清经法，李白的诗文里能找到与他的道术一致的道教词汇，而且其与上清经的关系可以具体指出。玉真公主的道术也是跟他们一致的，这表示焦静真、胡紫阳、李白、元丹丘和玉真公主在道教道术兴趣方面有一样的倾向。那么，李白被玉真公主推荐而进入翰林院，恐怕不仅是文学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道教道术信仰一致的结果。

当时一些道教词汇在诗作上作为某种意义符号被广泛运用，而就李白的交往以及用语情况来说，其词汇来源可以说是上清经典，至少可以说以上清经典为重要语源。我们由于研究李白所学到的上清经法、推测李白所据的上清道术，可以理解一



梁楷《李白行吟图》

纸本水墨，南宋，80.9 cm × 30.5 cm

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些诗的宗教想象力。考察道教术语的同时，应该对具体道士以及道观与诗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如果我们手里有道观的位置及其功能、道士的所在、他们的道术等道教社会史的具体研究资料，我

## 中国文化研究通讯

们就应当参考,通过这方面的了解,不仅可以解释诗人的宗教背景,而且进一步理解到他们的宗教想象力如何影响到他们的诗文创作。

## 注释:

- [1] 郁贤皓先生有仔细研究。《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97—113页。土屋昌明《李白的交游与道教》见《专修大学人文科学年报》32,2002年3月,133—149页。
- [2] 本文一些相关论点以前在日本发表过。土屋昌明《唐代诗人与道教——以李白为主》载《筑波中国文化论丛》23,2004年3月,27—53页。
- [3] 安旗先生将这首诗编年在开元十九年(731),见《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2000年。
- [4] 开元年间李颀住在洛阳。傅璇琮《李颀考》载《唐代诗人文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88—102页。
- [5] Paul W. Kroll, Notes on Three Taoist Figures of the Tang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1981, (9). Kroll先生也注意到《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4也有关于焦静真的记载,但是没有看到《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恐怕是资料出版情况的关系。
- [6] 《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后集》,见《道藏》,文物出版社等,第5册474页。
- [7] 《集仙传》,载《太平广记》卷66,中华书局,412页。关于谢自然传说,前人有详细研究。见深泽一幸《仙女谢自然的诞生》,见《兴膳教授退官纪念中国文学论集》1961年,日本汲古书院2000年,411—429页;《仙女谢自然的展开》载大阪大学《言语文化研究》27卷,2001年,233—253页。
- [8] 魏颢《李翰林集序》“白久居峨嵋,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见《李太白全集》1447页。持盈法师就是玉真公主。
- [9] 乾源俊《李白登科考》,见日本高知大学《文艺论丛》62辑,2004年3月,193—233页。
- [10] 稗山《李白两人长安辨》,见《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本文原载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图文转引自微信公众号“山水”。土屋昌明,日本专修大学教授。)
- 安旗先生继承此说,把这首诗编成开元十八年。
- [11] 《道藏》第6册548页。这一出典,Kroll先生也已经注意到。
- [12] 《灵飞经小楷墨迹》,上海书画出版社《滋蕙堂帖》影印本2000年。其卷头有启功先生《记〈灵飞经〉四十三行本》,载于1987年《艺苑掇英》第34辑。参见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92, 129—131页。据我了解,这个文本基本上与《道藏》第34册168页《太上琼宫灵飞六甲篆》是一致的。
- [13] 但是,认为李白受到玉真公主的照顾之前,李白受元丹丘的指教而作这首诗,也是可行的。因为《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云“西京大昭成观威仪臣元丹丘奉敕修建”,就是说,元丹丘早就得到玉真公主的信任,否则的话,既不会有这个西京大昭成观威仪的职掌,又不会修建这块备有御题额的名碑。元丹丘早认识玉真公主,那么,李白可以通过好友元丹丘而了解到玉真公主的道术。
- [14] 大渊忍尔《道教及其经典》(日本创文社1997年,403页)中说,南北朝上清派最重视的经典为《大洞真经》,而当时的《大洞真经》可能包括《上清紫文灵书》在内。那么我认为,《上清紫文灵书》可以说是南北朝上清派最核心的经典。
- [15] 《洞真上清青要紫书金根众经》,见载《道藏》第33册424—425页。
- [16] 《李太白全集》921页,王琦注:一作《天宝元年四月从故御道上泰山》。
- [17] Paul W. Kroll, LiP 6 s Transcendent Dic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86, 106(1). 中文见王元化主编海外汉学丛书《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80—110页。

# 中华文化干部学院

中华文化干部学院是经陕西省委组织部批准、在陕西省干部教育培训西北大学基地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建设的干部教育培训专门机构。学院立足中华优秀文化，融汇各方优势资源，着力于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立了“以史为鉴、指导实践、引领时代”的建院宗旨，形成了“坚定文化自信、专注政德修养”的办学理念，坚持“以文化人、行稳致远、进而有为”的培训目标。

## 一、历史沿革

为了适应大规模培训干部的需要。陕西省委组织部与西北大学于2004年9月，共同设立了陕西省干部教育培训西北大学基地，成为首批高校干部培训基地。根据省委组织部确立的功能定位，基地依托西北大学优势学科资源，围绕国家政策方针和陕西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项目，积极开发培训专题，搭建理论教育、现场教学和文化体验相结合的干部教育培训课程体系。聚集了张岂之、赵馥洁、王守常、李浩等省内外众多知名学者和专家参与的高水平培训师资队伍，形成了以历史文化教育培训为主的综合性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2018年11月，为了充分发挥陕西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建设特色鲜明的干部教育培训品牌，陕西省委组织部批准在陕西省干部教育培训西北大学基地加挂中华文化干部学院牌子，指导学院建立适应市场化管理模式的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通过校内选配和对外招聘充实基地和学院管



理力量，推动学院走出陕西，服务全国干部教育事业，力争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干部教育品牌。

## 二、组织架构

为了加强学院建设，学校成立了以校党委书记、校长为组长，主管副书记为副组长，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建设领导小组，专门研究和推进学院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学校党委副书记任中华文化干部学院院长，党委组织部部长兼任基地办公室主任。学院设立了教学管理与保障、人事财务、媒体网络、市场推广、对外合作以及教学开发六个部门，专业化分工大幅提升了学院的培训能力和服务效率。

## 三、地理位置

学院位于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毗邻西安古城墙，校园环境优美，文化气息浓厚，地理位置优越。西北大学博物馆、学校大礼堂等校园文化标识性建筑均座落于此，宾馆、培训楼、运动场、图书馆、教学楼等教学设施齐全。

学院持续致力于优化学习体验，打造专业高效的培训管理服务队伍，针对培训需求制定全面

## 中国文化研究通讯

的实施方案，用中华优秀文化为学员培根铸魂。在省委组织部和学校党委的高度重视和悉心指导下，学院上下同心、奋发向前，撸袖加油、创新创业，以《中华文化干部学院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为契机，以落实两千万专项建设经费为推手，建设工作大幅推进，各项指标显著提升。

### 四、业务范围

中华文化干部学院以高校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等教学研究力量为智力支持，以陕西省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红色革命文化场馆和以非遗为代表的民间文化等为空间载体，汇集校内外名师大家，选定众多的现场教学和文化体验培训基地，专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文化信仰坚定与政德修养提升，提供各类“订制化”“菜单化”“模块化”培训课程。创新干部教育培训模式，运用市场化机制开放办学。在完成省委组织部、西安市委组织部下达培训任务的同时，学院积极开拓省内、外培训市场，承接了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广东省、贵州省以及西藏等地的培训任务，年培训规模突破万人。

### 五、培训手段

学院积极搭建中华优秀文化培训与传播的开放平台。学院与省内干部培训机构开展合作，把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先进文化等资源统一融入中华文化培训体系，形成系列，突出优势。并与省外优秀培训机构合作，开展“联合培训”“分段教学”，承接整体或分段的文化培训任务。利用学校丝绸之路研究的优势，与丝绸之路研究院、国际汉唐学院等机构合作开展国际文化培训，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级文化培训交流项目，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学院探索创新干部教育线上培训的形式，用好网

络直播工具，发挥培训特色优势。充分利用小鹅通、腾讯课堂、腾讯会议等网络直播平台，积极开展干部教育培训网络直播课程。

### 六、师资队伍

学院坚持立足西大，依托陕西，面向全国的原则，邀请全国高校名师、各行业领域专家、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民间文化传承人等参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凝集了一支高水平的培训教师队伍。

### 七、课程建设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教学能力水平，学院狠抓课程建设，划拨专门经费，打造核心课程。现有省级“好课程”“精品课程”25门，市级“好课程”1门，院级“精品课程”14门。课程涵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碳知识普及、领导干部综合能力提升等内容。

为推动新时代追赶超越，引导领导干部提升科学素养，增强创新本领，学院邀请院士和知名文化学者张小曳、舒德干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省委副秘书长任宗哲以及知名学者肖云儒、雷雨等开设“文化大讲堂”。高水平、重量级的师资和课程更加突出了学院培训特色，彰显了文化传播力。

### 八、专题建设

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政治性、时代性、实践性和示范性，重点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干部政德修养、利用革命文化坚定干部信仰初心、利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面向全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级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开发培训专题。根据形势变化，设置相应专题，以符合干部队伍发展的需要。

学院采用项目负责制、委托制等方式开发专题，并根据行业需求开发定制专题。新专题实施前，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召开专题建设论证会，调整专题结构，完善课程内容。

学院开发建设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国学与中国思想文化精华”等文化传承类培训专题；“汲取治国理政智慧，加强政德修养”“中华优秀文化与社会治理创新”等国家治理类培训专题；“讲好陕西故事，提升陕西文化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中国影响力”等能力素质类培训专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党史，强党性”等党性教育类培训专题。以及针对行业部门定制开发的众多培训专题，形成了特色突出，覆盖面宽的培训专题体系。

通过专业、科学的专题建设，凝结行业培训需求与主题精品课程，融合创新教学方式，形成专题知识、教学方式、管理实施“三位一体”的专题培训解决方案，为培训单位提供明晰的干部培训路径和方向。

### 九、研究成果

学院紧跟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围绕热点问题，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坚持深入调研，系统分析，进行务实管用的教学研究，通过规律性认识推动实践发展。学院成立以来，共承接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社科联教学改革项目共6项：学院承担省教育厅2019年教学改革重点项目，省继续教育学会2019年教改项目，省委组织部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干部教育培训重点委托项目，省社科联和省委组织部2022年度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重点委托课题项目。通过课题研究带动，学院更加明晰发展方向，巩

固了开展专业化能力培训的实践成果。

2022年7月，学院常务副院长孙二丽在《陕西日报》理论版发表头条文章《用“两个结合”指导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 十、教材建设

学院注重对培训内容的总结积累，按照省委组织部的要求，发挥优势特色，完成专业化培训教材《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出版工作。学院推荐的《话说延安精神》入选全省干部教育培训好教材。在培训班次中，精选与培训专题相关的书籍作为干部学员的辅导教材。

### 十一、网络媒体宣传

学院高度重视宣传推广，为展示培训品牌，提升社会影响，强化传播能力，专门组建了一支“高效率，业务精”的媒体网络队伍，搭建了完整的自媒体宣传矩阵，以微信公众号为主阵地，辅以视频号、抖音丰富传播推广形式。公众号定时推送资讯，除学院要闻动态外，专题发布传统节日、诗词赏析、文化概览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内容，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打造文化传播平台；推送政策要闻、能力提升、廉政建设等党政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内容，宣传行业知识，建设干部网上学习平台。推送内容多次被省委组织部（陕西干部教育培训网）、省教育厅等上级媒体转发，收获一致好评。

2020年学院承办了“携手‘一带一路’·推动高质量发展”干部教育培训高校基地论坛，作为行业首个论坛，得到新华社、腾讯网、新浪、华商报、西部网、陕西党建网、陕西先锋、陕西日报等多家媒体广泛报道。论坛同步视频直播，在线观看人次超过20万。2021年学院承办了由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讲好党史故事，助力追

## 中国文化研究通讯

“赶超越”主题演讲竞赛，获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简报第40期刊登，决赛在陕西卫视播出，实现411万人次观看，社会反响热烈，得到人民日报海外网、新华网（新华号）、陕西日报群众新闻网等多家中省媒体广泛报道。原创“汉唐特色舞蹈”视频短片得到陕西省教育厅官方微博的报道，“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揭牌仪式得到新华网（陕西）、新浪、搜狐、腾讯、陕西五套等多家媒体报道。马来西亚古晋中华文化线上培训班得到三秦都市报、搜狐、腾讯等多家媒体报道。

### 十二、教学管理

学院以打造特色教学管理团队为抓手，锻造

了一支“高水平，有特色，敢创新，担重任”的教学管理团队。以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标准贯穿培训全过程，并在其中融入丰富多样的文化元素。以八段锦、易筋经为代表的课前活动，以宋代点茶、传统扎染为代表的深度文化体验活动，以徒步西大、趣味运动会为代表的创新拓能活动等，共同营造和谐、愉悦的学习氛围。大学精神与文化底蕴紧密契合，制度管理与人文关怀相得益彰。

在省委组织部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学院将不断开拓进取，努力建设成为陕西最亮、最好的干部文化教育名片，力争成为全国干部学院中的知名品牌。



“讲好党史故事·助力追赶超越”主题演讲竞赛



学院高质量发展推进会



2021 现场教学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

## 古代文学专家——张新科



张新科，男，出生于1959年，陕西眉县人，本科、硕士、博士均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199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晋升教授，2003年至2006年在四川大学师从项楚先生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技部、教育部“长安与丝路文化传播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负责人，陕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2009—2020），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18—2022），中国民协民间文化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社科联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

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委员，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等。

1986年开始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立德树人，孜孜不倦。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先后荣获国家级精品课（2008）、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2013）。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教学成果荣获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18）。主持的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师范生国学经典第二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结项等级为优秀（2017）。2009年被评为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011年荣获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奖。是教育部第二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省级、校级教学团队负责人。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记导读》等教材。指导的博士论文有2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专业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尤其是在《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史记研究史略》（合著）、《唐前史传文学研究》《史记学概论》《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史记与中国文学》《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等著作10余部，主编《史记文学研究典籍丛刊》《先秦两汉文观止》《史记研究资料萃编》《左传档案》等著作20余部。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

究资料整理与研究》等。《史记研究史略》被专家称为“一项开创性工作”，是“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的著作，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史记学概论》建构起“史记学”的体系框架，被专家称为“史记学”的“开山之作”，获陕西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从生命价值角度探讨古典传记，被专家称为“体大思精、新见迭出的宏著”，获陕西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著作《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第一次系统深入地对中外《史记》文学阐释史、审美效果史及经典影响史进行综合研究，专家认为“为具有多重属性的早期中国经典作品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

该著作入选 2019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另外，《古代赋论与赋的经典化》(论文)获陕西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著作)、《从唐前史传论赞看骈文的演变轨迹》(论文)、《史记与中国文学》(增订本)、《元代科举对汉赋经典化的影响》(论文)获陕西省人民政府第七次、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还有多项成果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著作《史记与中国文学》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被译成英语在海外出版，主编的著作《史记与治国理政》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丝路书香”工程，将被译成俄语在海外出版。



## 鲁迅研究专家——姜彩燕



姜彩燕,女,陕西省榆林市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200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曾赴韩国江陵女子高等学校任教,2006年在韩国首尔孔子学院任教,2014年赴韩国东国大学任教。

教学方面,她先后为本科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20世纪中国文学名著导读》,为硕博研究生讲授《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外文学专题》等课程。2002年曾获西北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2020年获西北大学优秀教师、西北大学优秀硕士论文指导教师称号。

姜彩燕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鲁迅研究、疾病与20世纪中国文学、西北联大与中国现代文学等。共主持科研项目8项,其中代表性研究项目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鲁迅儿童教育思想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疾病与20世纪中国文学”,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学术史视野中的陕西鲁迅研究”。参与编著《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鲁迅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延安文学档案·小说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年)《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朝花夕拾〉导读》(北方文艺出版社2021年)。曾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21年)、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两次(2020年、2009年)、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21年),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9年)。

姜彩燕教授长期从事鲁迅研究,主要偏重于鲁迅教育思想研究。其论文《旷野上的呐喊——教育主体缺失的危机与鲁迅“救救孩子”理想的失落》《从“立人”到“救救孩子”——鲁迅对〈儿童之好奇心〉等论文的翻译及其意义》《从“弃文从教”到“弃教从文”——试析鲁迅对教育与文学的思考与抉择》《对儿童的失望与对教育的怀疑——试析1923至1927年鲁迅教育思想的转变》《从天使到“幽灵”——鲁迅与玩具考述》《“立人”之路的两种风景——试比较鲁迅与周作人的儿童教育思想》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其中

## 中国文化研究通讯

《鲁迅对朱光潜的批评缘起重考》一文，在史料发掘和研究视角方面都有所创新。关于鲁迅和朱光潜的论争，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他们在政治立场、思想派别、美学观点、治学方法等方面的分歧，鲜少注意到他们都关注青少年的教育问题。该文认为，鲁迅和朱光潜都关注青少年读物和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并且都与开明书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才使他们的目光有了交汇点，也是令他们有机会发生冲突的一个原因。论文通过大量原始资料的爬梳，尤其是对学界不太重视而鲁迅曾密切关注过的两本杂志《一般》和《中学生》的系统阅读，重考鲁迅对朱光潜的批评之缘起。将朱鲁之争从通常文学史上所说的 1935 年提前到 1926 年，这一考证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段文坛公案，对朱鲁之争的“前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此外，姜彩燕教授还致力于鲁迅学术史方面的研究，特别注重发掘本地学术资源。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的《单演义“鲁迅在西安”的研究及其意义》和《学术史视野中的鲁迅形象——侯外庐的鲁迅研究及其意义》，都是对西北大学鲁迅研究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发扬。2021 年在《现代中文学刊》发表的《鲁迅西安讲学与当地报纸相关报道新考》，以 1924 年 6—8 月份的《新秦日报》《建西报》《旭报》的相关报道为中心，对鲁迅西安讲学的相关史实做了一些还原和补正的工作，尽量摈弃历史的偏见，发掘出一些之前从未面世的新史实，对于了解鲁迅西安讲学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反响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鲁迅在西安的相关课题提供了第一手文献史料。

依托教育部项目“疾病与 20 世纪中国文

学”，姜彩燕教授撰写了系列论文，其中《疾病的隐喻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全新视角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书写现象，首次总结出现代文学中常见的几种疾病隐喻类型，并将个人体验和家国叙事结合起来，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的疾病书写中所附带的社会、文化、道德、政治或者美学含义。从现代作家的疾病书写角度透视整个现代文学的启蒙主题，发掘疾病书写的文学意义以及文学所承担的疗救功能，这一视角为现代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疆域，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论文发表后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并作为代表性论文被收录在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中国文学年鉴》(2008)中。

姜彩燕教授近年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西北联大”与中国现代文学，其论文《“西北联大”的文学教育与文学活动考述 1937—1946》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首次对西北联大的文学教育与文学活动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的研究成果，不仅将研究对象放置在抗战时期的社会大背景下，而且关注西北联大师生的文学创作与上世纪 30—40 年代其他现代文学流派或团体的交叉互动，力求呈现抗战时期高等教育与文学创作的多元性、开放性、流动性的特征，这对重新理解抗战时期的现代文学发展史，了解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史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论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 年第 9 期发表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21 年第 1 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1 年第 1 期论点摘编，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 新书推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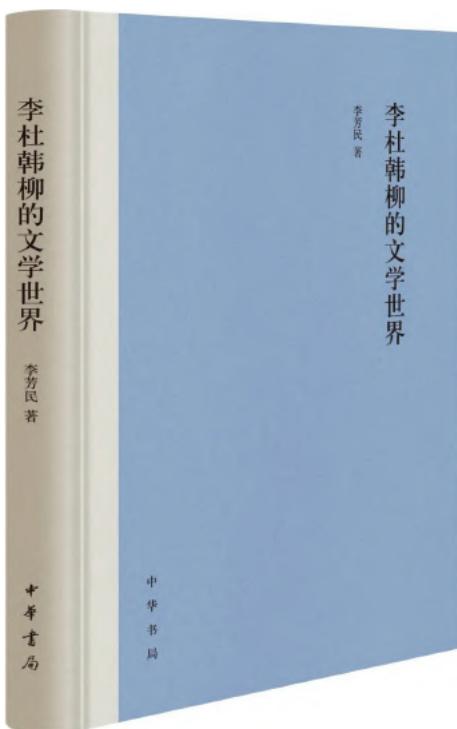
## ◆《李杜韩柳的文学世界》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唐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李芳民所著的《李杜韩柳的文学世界》于2022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以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四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影响深远的作家为研究对象，分为“谪仙的遭际与诗文”、“诗圣的理想与情怀”、“文坛北斗韩昌黎”、“屈子遗魂柳河东”四部分，主要围绕他们的人生遭际、政治理想、个性品格、家世家风及文学创作来展开论述分析，对其文学世界进行了新的挖掘，揭示了四位作家独特的个性品格与杰出的文学创造。附录四篇论文，则论及张九龄、岑参、李商隐与苏轼，或考证生平，或分析作品，重在掘

发覆，阐述新意。

该书的特点，一是以问题为中心，或就具体问题做出探索开掘，或就具有重要意义的论题展开讨论，力求言之有物，提出作者的新见，不作浮泛空论。二是通过作家遭际、个性、品格的分析与考索，揭示四位作家的个人遭际对文学创作个性形成的影响。三是从不同角度、运用多种方法来观照所研究的对象，深化问题的讨论。其中既有文史结合、考证辨析等传统方法的运用，也有家族与文学、空间与文学、文化记忆与文学等新方法与理论的借鉴。视角与方法的多样，使研究的深化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 ◆《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

《唐代文学研究》是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刊,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与西北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唐代文学研究》第二十一辑于2022年7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辑主要选录了2021年12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与内蒙古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十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的部分论文及部分自由投稿。围绕版本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新视野、接受传播与域外汉籍、诗人生平与经典作品、唐诗题材与唐史研究四个

主题,收录了中国大陆学者、台湾学者、日本学者及新加坡学者的研究论文共计15篇。这些文章或是将作家作品置于宏观语境下进行考察,从而提出新的思考;或是运用新材料、新思路对学界有争议或存疑的传统问题进行新的探究;或是着重于文本细读,发扬文献、文史实证的学术传统;或是探讨前人少有关注的作家及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问题。全书涉及的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视角也具有多元化特征,呈现了海内外唐代文学研究界的新成果,富有学术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